

服务经济译丛

主编 江小涓 薛 澜
总校译 许德金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英] 克里斯廷·达斯特曼

[德] 伯恩德·斐岑伯格

[英] 斯蒂芬·梅钦

主编

杨 娟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服务经济译丛

主 编 江小涓 薛 澜

总校译 许德金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英] 克里斯廷·达斯特曼

[德] 伯恩德·斐岑伯格

[英] 斯蒂芬·梅钦 主编

杨 娟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英)达斯特曼(Dustmann, C.),
(英)斐岑伯格(Fitzenberger, B.), (英)梅钦
(Machin, S.)主编;杨娟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服务经济译丛)
ISBN 978-7-5432-2009-6

I. ①教… II. ①达…②斐…③梅…④杨…
III. ①教育经济学—研究 IV. ①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5402 号

责任编辑 王 静
装帧设计 陈 楠

服务经济译丛

教育与培训经济学

[英] 克里斯廷·达斯特曼
[德] 伯恩德·斐岑伯格 主编
[英] 斯蒂芬·梅钦
杨娟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格致出版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4
字 数 450,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009-6/F·471
定 价 48.00 元

“服务经济译丛”即将出版。现将出版宗旨、选书标准和丛书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从经济理论研究的角度观察,“服务”与“商品”的性质有很大差异。服务的定义和测度方法,服务业的劳动分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变化等都有独特性,服务业还广泛涉及一些超经济、非经济的问题。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含义及其对增长、就业、物价、收入分配和国民福利的影响,比物质产品为主的时期更复杂。理解服务经济,找到适宜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需要长期理论研究的积累和支撑。

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相比,我国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国外服务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不足。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较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因而服务经济理论研究也发展较早,相对成熟。翻译一批国外经典文献,是促进我国服务经济理论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丛书首批译著共有 15 本书,其中服务经济理论有 6 本,服务行业研究有 6 本,服务全球化研究有 3 本。下面分三个方面,对各本译著的主要内容做一概要介绍,并就理解服务经济特殊性的角度和思路做一些探讨。

一、服务经济理论及相关测度和统计问题

研究服务经济时,最先碰到的困惑往往是服务的独特性质、服务体系的构成和服务业中不同行业的性质差异。服务的本质特点是非物质性,即服务的结果不是有形产品。服务业既包括传统“纯劳务”型的家庭服务、保安服务等,也包括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信息服务和知识含量很高的研发、创意服务等,还包括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社会管理和政府部门等公共属性很强,市场失灵比较突出的各种服务。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经济性质很不相同。传统劳务型服务业缺乏规模经济,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却具备了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特征。其中电信网络服务等更具有网络外部性等独特的市场特征。

服务经济的上述特征给理论研究带来不少难题,也导致了一些易误易谬的问题。举几个典型

例子。一是对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多重含义理解不足。在不少服务业特别是以提供劳务为主的服务业中,劳动生产率上涨缓慢甚至“停滞”,劳动成本的上涨直接传递为服务价格的上涨,此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并不是服务量的实质增长,而只是服务价格上升相对较快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成本病模型”,已经成为服务经济研究基本出发点之一。但是,国内许多方面包括不少研究者对其理解不足,在主张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却对“非生产加工环节”在产品价值链中比重上升、服务价格持续较快上涨等现象难以接受。然而,服务业比重上升这种宏观趋势的微观表现,就是产品价值链中服务环节所占比重的上升,不可能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二是对精神和心理需求在服务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理解不足。在实物经济为主的时期,人们追求食品、服装、汽车、住宅等“物品”,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服务经济比重上升,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精神和心理消费在消费总额中比例的上升。如果认为“商品”与“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就要承认物质和非物质两种消费行为同样重要: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任天堂的游戏和迪斯尼的米老鼠满足了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然而这种理念远未形成共识。三是服务业的“共性”难以概括,服务业各个行业性质和特点差异大,反映服务业一般特征的普适分析框架不易构造。四是服务业测度和统计困难,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都是遗漏较多的部门,我国也不例外。

本译丛中主要讨论上述服务经济基本问题的有6本著作。《服务经济思想史——三个世纪的争论》(*Services in Economic Thought: Three Centuries of Debate*)是关于服务业经济理论演进的经典综述。作者对三个世纪以来服务经济思想的发展作了梳理,引述了近百位学者的观点,并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在结尾部分,作者提出了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今天来看,大部分仍然是服务经济理论研究中最有挑战和最有意义的问题。《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是一本文集,涉及服务业核算中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内容包括:使用修正过的数据测算服务部门的产出,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测算,6个特定服务行业产出的测算等。此外,

还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服务业的微观基础、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以及公共部门四个角度,讨论服务部门的统计测算及其影响。《服务业的增长——成本激增与持久需求之间的悖论》(*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The Paradox of Exploding Costs and Persistent Demand*)是一本论文集,作者使用多种方法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探讨服务业成本病是否依然存在、服务业真实产出份额是否下降、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建立“成本病模型”的鲍莫尔教授是本书第一章的作者,他根据新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与增长》(*The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也是一本论文集,焦点集中在与服务业增长和生产率有关的问题上,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服务业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服务业较低的技术变化速度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的关系等。《生产率——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复苏》(*Productiv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一书,阐述了自 1995 年以来,信息技术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影响,追溯美国经济复苏性增长的源头。作者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评估 1989—2004 年间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者在书中所用的方法,已成为生产力测算的国际标准,这项研究也成为分析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个范本。《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新经济与社会经济方法》(*Productivity,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n Services: New Economic and Socio-Economic Approaches*)是一本论文集,鲍莫尔为此书作序并撰写了其中一章。书中论文聚焦于服务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的内容包括服务业增长滞后的真实性问题,生产率概念在服务业中的误用问题等。书中还有若干章研究服务业的创新问题,包括知识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生产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中的作用等。

二、若干服务行业研究

服务部门行业繁多,不同行业性质差异很大。译丛首批选择了 6 本研究特定行业的著作,重点是国内从经济角度特别是服务业这个角度关注不足的行业,如教育、医疗、体育等行业。这些行业

以往主要被归为“社会事业”领域,对其经济性质重视不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多的消费者愿意增加教育、文化、卫生等消费支出,使得这些“社会事业”的经济性质明显增强。因此,需要增加经济学的视角,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行业的多种性质,特别是作为服务产业的性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通过市场配置部分资源的必要性。需要看到,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真正的免费,而是居民以纳税方式集体付费,以这种方式提供的服务内容,既需要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也需要有比较完善的提供网络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够平等地分享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等。而许多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需求分布不均匀,愈是中高端消费和新拓展的领域,往往较高收入居民消费较多。例如,城市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出农村青年,如果高等教育免费或者财政大幅度补贴,就相当于补贴那些相对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当然,孩子在任何阶段都不应因为家庭贫困而不能接受教育,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所有阶段的教育都免费,而是通过助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例如从前些年某项社会事业投入的平均收益率很高这个现实,就认为今后继续增加投入就会获得同样高的回报率,这种方法在社会事业领域的分析中较常见到,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是用平均收益率取代边际收益率的不当方法。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高全面素质,肯定有较高的个人和社会回报,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也可能总体上有正的回报。但是,如果没有跟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有机结合,如果没有能够跟受教育者未来的职业发展需求很好地结合,这种教育服务的投资就有可能回报极低甚至是负回报了。

丛书中有关行业性研究的几本译著,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权衡不同的利益关切,统筹考虑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教育与培训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是一本论文集,对教育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有新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的新进展。研究内容包括各类资源对学生的成绩的影响,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进行政策干预的效果,哪些因素影响教育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等。书中还研究了与职业培训相关的问题。《要钱还是要命——给美国医疗体制的一剂强药》(*Your Money or Your Life: Strong Medicine for America's Health*

Care System)一书,介绍了美国医疗体系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各国医疗体制发展改革中的若干共性问题,讨论的内容涉及如何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如何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卫生服务及医疗融资体制,如何在保证国民健康水平的前提下控制快速增长的医疗开销等问题。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存在的缺陷,后半部分通过经济学的视角,为如何解决医疗融资、保险覆盖、支付手段以及成本与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建议。《旅游和休闲业——塑造未来》(*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Shaping the Future*)是一本论文集。作者认为,面对经济社会新的重大变化,需要研究这些变化对未来休闲行为的影响。文集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变化和休闲时间的变化,生活步伐放缓的要求与全球化加快发展之间的冲突,文化性休闲行为,生活方式的变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等,以及这些因素对未来休闲和旅游产业的影响。《体育经济学》(*The Business of Sports*)第一卷和第二卷是两本研究体育经济的论文集,涉及的经济视角包括产业组织、团队所有权、投入产出关系、组织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融资和设施建设、市场化及非市场化收益等。前一本文集的内容包括:美国体育产业概况,体育团队盈利能力,大型赛事对举办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职业运动的收益,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体育转播和内容销售方式等方面影响,大学体育发展等。书中有一章专门分析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后一本文集的内容包括:比赛中的奖金分配问题,体育联盟问题,职业体育中的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政府行为和体育活动产生的非市场化收益问题,体育场馆设备的融资问题等。《世界电信经济学》(*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ics*)是一本关于电信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概论性著作,可分为电信产业简介、电信经济学理论、管制政策及企业运营四个部分。内容包括:电信业务的供给和需求,电信市场结构及其变化,电信业务运营成本,电信业务价格的确定,电信产业所有权,电信产业的管制政策,电信产业的普遍服务,电信产业经济绩效及服务质量的衡量方法等。

三、服务全球化和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研究

研究服务全球化问题有一些理论特点和现实难点。首先是定义和统计问题。“服务贸易”与

“商品贸易”的含义相差甚远,商品贸易主要的形式是商品的跨境交易,服务贸易却包括服务本身、生产要素、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消费者中任何一项的跨境移动。服务贸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过境贸易,即服务产品跨境交易,例如出口影视产品贸易和软件贸易等;二是当地贸易,即服务消费者跨境消费,例如入境旅游、留学生教育等;三是商业存在,即服务供应商跨境提供服务,例如设立外资服务企业;四是自然人过境服务,即服务供应者跨境提供服务,例如从国外聘请教师、医生护士等。由此可见服务贸易定义的宽泛及统计方面的困难。第二,服务外包这种独特贸易形式产生的问题。服务外包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结论,例如贸易双方的距离已经不是贸易流向的决定因素,对贸易区域分布理论产生影响;例如劳动力“虚拟跨境流动”的现象,即不必发生人员跨境流动,却能向境外提供劳务,减弱了距离、文化差异和各国移民政策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限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地位重要。第三,人力资本在服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制造业可以以资本和设备为主要载体实现跨国转移,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都需要人直接参与,人的流动是多种类型服务跨境转移最重要的载体。第四,部分服务业具有社会和政治敏感性。对进入诸如文化、传媒、通讯、网络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无论是东道国还是投资方,都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影响,东道国政府对开放这些行业也相对谨慎,需要权衡利弊,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成本之间、在开放获益和控制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丛书中关于服务全球化方面的译著有 3 本。《国际服务贸易手册》(*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对服务贸易做了全面介绍。前半部分包括服务贸易相关理论问题的概述,《服务与贸易总协定》及其影响,服务贸易的基本原理以及不同形态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法等。后半部分是若干服务行业的研究,包括金融服务贸易问题,贸易政策对运输服务的影响和作用,国际电信和信息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健康服务和健康政策的制定,电子商务的经济规模和监管问题等。《服务业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启示》(*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是一本论文集,除总论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服务业外商投资产生的背景,包括

紧随客户、市场营销发展、服务可交易性等。第二部分阐述服务业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和服务业国际化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公司竞争力、声誉、专业服务、创造和传播知识的能力等。第三部分介绍几类服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案例,包括航空服务、快递服务、酒店服务等。《21 世纪的外包与离岸外包——一个社会经济学视角》(*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in the 21st Century: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也是一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离岸外包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外包的分类、外包方式选择、外包与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电子商务离岸外包等。第二部分是外包决策和风险控制,包括外包决策的分析、外包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开放源代码和软件外包问题等。第三部分是印度、德国、西班牙等国别案例分析。书中还有一章专门分析了大型 IT 外包项目“失败”的案例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最后对丛书的译校者团队作一点简介。

丛书的主编对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已经准备了数年,从近百本备选文献中挑选出 20 本著作,因版权等方面的原因,最后选定了 15 本作为译丛首批著作。本书翻译团队的成员大多数是长期研究服务经济问题、具有高级职称的著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人民日报社等机构。总校对许德金教授负责组织了以对外经贸大学教师为主的校对团队。为了体现丛书的性质并确保译著质量,翻译工作开始前,译者和校者团队举行过数次工作会议,商议各种细节,形成了丛书统一的规范要求。每本书都经过了三次校对,译者和校者都有过多次沟通,反复修改。总校对除了制订校对的总体方案,还同时承担了所有译著的三校工作,对每本译著均亲自阅读过目,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每本译著都能做到意思准确、用语规范、文字流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CIDEG 的部分学术委员组成了丛书的编委会,对丛书的选择、翻译和出版工作提供学术指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总裁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学术性著作的出版,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予以了积极支持,



提出了做好翻译出版工作的具体要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格致出版社负责具体的出版工作,何元龙社长、王伟先生及忻雁翔女士深度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译校工作全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各本书的责任编辑耐心细致地编辑每一本书,为丛书的质量把好了最后一关。

衷心感谢所有为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而努力工作的同仁和朋友。

这套丛书还将努力做下去,译介服务经济领域更多的国外经典和前沿文献,推动我国服务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江小涓 薛 澜

最近几年,又掀起了一股教育与培训经济学的热浪。这股热浪来自很多方面,包括学术研究、政策建议以及媒体的报道。这部收集教育与培训经济学各领域的著作,反映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

教育与培训是解释当前国民经济的竞争优势以及确保今后竞争力的核心元素。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民经济需要在可交易商品的生产、现代科技以及一系列服务中具有竞争力。目前经济发展有在国家层面上专业化的趋势,例如,德国一直是制造业领域的龙头,而英国正在从该领域撤出,更专注于金融产品和其他贸易服务。过去——可能一直到第一次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之前——的许多欧洲大陆的国家,教育与培训机构被认为只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技能,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与培训被看成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组成要素,而教育机构帮助提供确保竞争力的教育。

在过去的 10 到 15 年间,教育机构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首先,现在有较强的趋势促使教育机构为新一代工人提供个性化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种培训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其经济地位,而不是确保公平。特别是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这种情况尤为显著,由于过去的改革主要考虑机会的平等性,现在则强调根据个体的能力进行教育。第二,改革的议程更加开放,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引入了其他国家证明比较成功的课程。此外通过引入可比较的学位,使国民教育更加规范化,关于高等教育的博洛尼亚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认为在准市场的环境中提供教育更加有效。学校间的竞争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并不新鲜,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现在有增加的趋势(例如,增加了公开成绩表的压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对基金和有支付能力学生的争夺已成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确保运营资金的重要部分。如果在欧洲引入可比较的学位,欧洲大陆的国家名字将很快出现在该名单中。第四,传统上认为提高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培训体系以及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在欧洲许多国家进行了相似的改革。德国最近在公有部门提供的培训项目中引入了准市场机制(教育券,绩效标准)。

由于在这方面研究兴趣的增加,《实验经济学》特刊收录了相关的这些文章。它们涵盖了目前教育与培训经济学核心问题中的很多领域。主要包括教育财政,学校到工作的转型,教育的组织结构,教育质量以及相关话题(如同伴和教师的质量)。这些文章也包括了关于职业培训活动的相关内容,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受特定目的项目或其他制度的影响。本前言的其他部分概括了这期特刊的主要贡献。我们首先开始介绍单个国家教育体系特定方面的文章。前八篇文章涵盖了学生资助的影响、时间分配、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学校的入学年龄、同伴效应以及教师的排名。接下来两篇文章是以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数据为基础的国际学生成绩的比较。最后的三篇文章是关于职工的培训,其中一篇文章研究了工会对培训的影响,另外两篇文章涉及培训项目的评估。

米雪·贝劳特、埃里克·坎顿和丁南德·韦宾克的研究探讨了荷兰高等教育中学生资助对绩效以及学生时间分配的影响。1996年的改革使最长的资助时间减少了1年,仅限于学位的正常完成时期。这项改革可能对学生的经济状况产生显著的影响。作者应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改革的影响。最主要的发现是改革后,学生在学习阶段的早期降低了转换项目的概率,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并且在学习或工作上的时间没有增加。此外,对于在20岁以前学习的个体,所有的绩效变量(包括项目转换、完成课程的比例、第一年的完成率以及平均成绩)都很显著。这些发现与最近关于能力较高学生处理效应的异质性的研究相一致。

第二篇文章转向时间分配与教育的关系。克里斯廷·达斯特曼和阿瑟·范·索斯特分析了兼职工作对仍接受全日制教育的青少年学业表现以及离校决定的影响。这篇文章的估计方法考虑了这些可能事件的相互独立性,并且将两种不同的状态(即全职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接受职业培训)与全日制教育相区分。作者运用相对灵活的方法估计了这一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为包含非常丰富学校和家庭背景特征变量的英国儿童发展研究(NCDS)。最主要的发现是全日制学生兼职工作对于女性的考试成绩仅有很小的负面影响,对于男性没有显著影响。兼职工作对于男性的离校决定也仅有很微弱的负面作用,对于女性没有影响。另一个影响学生考试成绩以及离校决定的重

要变量是父母对孩子今后职业生涯的预期。

丹尼尔·米莉美特和欧泽肯·埃伦应用参数与非参数的技术,估计了在教育生产函数中相对很少被探讨的投入“所分配的时间”对学业成绩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学年的长度,每天课时数以及每节课的时长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但其对于整个成绩分布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都不是同质的。他们发现较短的学年有利于成绩分布高端的学生,但较长的学年会增加成绩分布低端学生的学业成绩。此外,如果每天至少有8节课,每节课时长平均为46—50分钟将有利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提高成绩,但每天仅有7节课,每节课时长不超过45分钟或多于51分钟的安排有利于成绩分布高端的学生提高成绩。

奥斯卡·马塞纳罗-古铁雷斯、费尔南多·加林多-鲁德和安娜·维尼奥尔斯主要研究了谁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一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很关注的政策问题。人们担心来自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作者应用青少年群体研究数据库分析了1994—2000年间家庭背景与上大学概率关系的变化趋势。该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参加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阶层不平等现象,但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因于教育体系早期的不平等所致。如果考虑到中考(GCSE)和高考(A-level)的成绩,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孩子上大学概率的影响将不再显著。

帕特里克·普汉尼和安德烈亚·韦伯根据德国两个不同的数据库(样本分别为小学快毕业的学生以及中学中间阶段的学生),估计了入学年龄对教育结果的影响。他们通过将出生月份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在7岁而不是6岁入学对于学习成绩有稳健且显著的正向作用:小学最后一年的学业成绩可以增加0.4个标准差,参加最好的中学教育轨道(语法学校)的概率提高了12%。

鲁道夫·温特-艾伯莫尔和尼科尔·施内维斯调查了奥地利的教育生产函数,并主要探讨了同学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他们根据PISA 2000和PISA 2003数据库,研究了同伴效应对于15岁和16岁学生的影响,并应用学校固定效应控制了学生进入特定学校和同伴组的潜在的自选择偏差。

结果显示,同伴效应对于学生的阅读成绩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于数学成绩的影响不太显著。此外,同伴效应对于来自较差家庭背景的孩子的阅读成绩影响更大。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同伴效应的影响在整个成绩分布上是不对称的,对于能力较低的学生影响更大,也就是说能力较低的学生与聪明的同伴一起学习更受益,而能力较高的学生同伴效应不明显。

克斯廷·施奈德和亨德里克·朱尔金斯探讨了教育生产函数的另一个方面,教师质量的排名。经济理论认为根据学生的相对成绩奖励教师是最优选择。作者在随机边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公正的教师排名。该排名考虑到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差异以及数据中固有的不准确的成绩。并应用德国的国际阅读素养研究(PIRLS)数据库,揭示了数据中的层级结构,估计了每位教师的绩效。该研究通过较少的变量,估计了无法观测的教师质量。作者们认为豪斯曼-泰勒型的评价指标是一个较理想的评价指标,因为教师的绩效和一些外在变量是相关的。

在关于丹麦的研究中,比阿特丽斯·欣德尔-兰威德将第一期 PISA 研究的数据与行政登记数据相结合,估计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校融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行政数据可以将家庭背景数据加入到同年龄组的 PISA 学生群体中,以弥补学校组成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估计的结果是建立在一套包含非常丰富的家庭背景和学校变量的 PISA 数据基础之上。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在整个有条件的阅读素养成绩分配区间,学校的组成效应对于在较低分位点的学生成绩提高最多。数学素养的成绩则表明能力较低和能力较高的学生参加由较好学生组成的学校获益相同,但大部分检验结果对于科学素养的成绩仅在边际上显著。这些结果暗含着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混合,有利于提高阅读和数学成绩的公平性,但平均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仅对阅读素养适用。对于数学成绩而言,将学生混合对于提高平均成绩没有作用,因为混合不同背景的学生使其对较差学生的积极作用与对较好学生的消极影响相抵消。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讨论了单一国家的情况。路德杰·沃曼和托马斯·富克斯通过 PISA 学

生层次的数据库,估计了国际教育生产函数。学生特征、家庭背景、家庭投入、教育资源、教师质量和制度因素都与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息息相关。他们的模型揭示了国家间学业成绩差异原因的85%,其中大约25%来自制度因素。校外考试制度、外在的预算机制以及学校在教科书的选择、教师的雇用和校内预算的分配有自主权的学校,有利于提高学生成绩。自主权对于存在校外考试制度体系的学生成绩更显著。学生成绩在私立学校的表现更好,但私人资助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还不确定。

在第二篇关于国家间比较的研究中,安德列亚斯·安默穆勒利用PISA 2000年数据分析了芬兰和德国的学生成绩在总体水平和差异度方面的巨大差距。为了解释芬兰学生成绩较好的原因,该研究根据一个包含估算数据和学校类型信息的独特微观数据库,分别估计了两个国家的教育生产函数。根据奥斯卡—布林德(Blinder-Oaxaca)和朱安—墨菲—皮尔斯(Juhn-Murphy-Pierce)分解方法,阅读素养成绩的差异被分解成不同的效应。分析显示德国学生除了最低10%的学生外,学生和学校的平均特征均好于芬兰,但这些特征所带来的回报(以成绩为衡量标准)却远远低于芬兰。学校类型对学生成绩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此外,可观测到的特征变量对于德国学生成绩差异的解释力度高于芬兰。

这本书的最后几章是关于培训经济的一些研究。托马斯·勒米厄和大卫·格林根据成人教育与培训调查(AETS)数据,研究了加拿大工会对于培训经费来源和培训频率的影响。简单的描述统计显示,工会工人相对于非工会工人更愿意参加培训活动。工会工人参加培训活动的次数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雇主提供这类培训活动的机会大于非工会工人。这意味着工会工人更愿意参加增强其公司专有人力资本的培训活动。但当作者控制了一系列变量,例如年龄、受教育水平、公司规模以及资历时,工会的作用消失了。也就是说,当其他特征相同时,工会对于促使公司提供更多培训的作用很小。最后,该研究还显示工会对于公司增加培训投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接下来一章是对于培训项目评估的研究。杰弗里·史密斯和米亚娜·普莱斯卡研究了美国参

加者可以选择多种培训项目的评估。理论部分的讨论概括了将培训项目整体评估与单独评估每一个具体项目的区别。根据美国国家工作培训实习草案研究(JTPA)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分开估计多层次培训项目是有意义的。该研究既包括了实验数据,可以作为一个基准,也包含了非实验的数据。JTPA 实验根据不同的服务,将项目分成了三个“处理流”。与以前将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同,该研究将三个“处理流”进行了一一分析。尽管样本规模有些偏小,该研究仍证明了项目运行的潜在价值以及将项目整体进行评估遗失了一部分影响。此外,单独分析个体处理流中每一个项目,还可以得出许多宝贵经验。

斯蒂芬·斯佩克泽和伯恩德·斐岑伯格研究了德国的培训项目,他们估计了德国最重要的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专有职业技能和技术培训(SPST)对于就业的影响。该分析应用了最近刚公布的行政数据库。实证部分通过以倾向分为基础的当地线性匹配法,根据已经逝去的失业持续时间,估计了 1993 年进入失业的人群接受 SPST 项目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项目开始后的一段时期有一个负的锁住效应,但在项目开始后的一年后就有显著的正的处理效应,可以大约提高 10 个百分点的就业率。对于所关注的逝去的三个失业时间间隔,估计的处理效应的总的特征非常相似。这个积极影响会一直持续到评估期的结束。相对于原民主德国地区,该影响对于前联邦德国地区更显著。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论文来自 2005 年 3 月在德国曼海姆 ZEW 召开的“教育和培训:市场与制度”会议,该会议由德国研究基金通过“异质性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度”研究网络资助,参见 <http://www.zew.de/dgflex>。11 篇文章来自实验经济学特刊,两篇文章发表在常规的实验经济学杂志上。

[英]克里斯廷·达斯特曼 [德]伯恩德·斐岑伯格 [英]斯蒂芬·梅钦